

陇上英烈——保至善

□ 牛旭东

1928年4月的一天,郑州一处监狱的刑场上,一个脚戴镣铐、浑身伤痕但却身形挺拔的年轻人仰头望天,目光坚定而澄澈,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半晌后,枪声响起,年轻人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党在甘肃早期领导人之一、甘肃工农运动的领袖——保至善。

保至善,字乐庭,1902年出生于甘肃省崇信县锦屏镇西街一个商贾之家,是家中次子。他的父亲保万众靠经商起家,所创办的“宗盛和”商号在当时县城的四十多家私人商铺中也是首屈一指,商号所发银票可在崇信和平凉各县区兑换,因而在当地和周边县区颇有名气。保万众还一度担任崇信县商会会长和民团团长,在政商两界都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影响。

1907年,县城初设官立初等小学堂,保至善遂入学读书,毕业后又入高等小学堂学习。1920年,刚满十八岁的保至善就在父母的极力促成下结婚,妻子是当时的崇信首富梁凤鸣的次女梁春娃。在父母的安排下,保至善或许可以就这样一生衣食无忧,但随着年龄渐长,他亲眼目睹了小小的县城的大事小事,土匪来犯、革命党进城让他记忆犹新,关于外面时局变化的听闻也让他充满疑问,他不愿再苟活于这小城之中,想要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找答案。

1920年,独自在自家商铺的平凉分店给兄长保性善帮忙照看生意的保至善听闻省立第二中学(现平凉一中)招生,便立即报名,并顺利考入。相较于地处偏僻、闭塞落后的崇信,地处平凉的省立二中无疑可以让他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接触到更新的思想。入学不久,保至善就在同学的介绍下通过代办站购买了一本《新陇》杂志,这本由甘肃旅京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创办的进步刊物,以传播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新文化、新思想,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为主旨,每期就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发表评论,并转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文章。这本杂志为保至善打开了一扇新思想的大门。之后他又陆续读到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其中的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为他参与进步活动、进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在省立二中读书期间,保至善还结识了他一生的挚友——王孝锡,他们志趣相投,一同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积极投身到反封建、反礼教的活动中去。针对学校存在的腐败和不合理现象,他们共同组织学生罢课、闹学潮,在平凉及周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3年,保至善中学毕业,亲朋好友就送来

许多牌匾,上书“垂天之翼”“荷天之宠”“任重道远”等字以示庆贺。自1902年废科举、兴学校后,平凉直到三年后才创办了“陇东官立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甘肃省立第二中学。

1924年1月,中华民国陕西省政府将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水利工程专业学校、渭北水利局附设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及甲种商业学校合并,重建国立西北大学,2月发布公告,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听到消息后,保至善写信与王孝锡相约,一同报名进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由此,保至善也成为崇信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

3月初,国立西北大学开学,作为在政府扶持下新办的大学,既有傅铜、李仪祉这样的学者专家坐镇,又有许多来自于北大清华的年轻教师任教,其中也不乏部分共产党员,因而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保至善和王孝锡入学后就与甘肃各地前来的学生一起成立了“旅陕甘肃学会”。作为平凉学潮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保至善和王孝锡等人牵头,在学会中创办了《觉院》月报,用以抨击时政,宣传进步思想,主要在西北大学校内发行,并通过甘肃籍学生流传至甘肃各地。

同年7月,为提高西北大学知名度,陕西省教育厅联合国立西北大学举办暑期学校,邀请在北京大学兼职的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东南大学教授刘文海、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钟凡和北大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瑛、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学者名流来西安讲学,听讲的除西北大学师生外,西安各中小学教师、各县劝学所代表共七百余。

在学校期间,保至善也接触到了许多进步老师和共产党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刘含初。刘含初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系,在李大钊的直接帮助下参加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加入中共党员,国立西北大学创建后在校任教。在他的推荐和影响下,保至善阅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独秀文存》等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

1924年秋,西北大学学生在爱国老师和学生会的组织下,联同西安其他大学开展进步活动、闹学潮,但因为受到了校方的阻拦和政府的追查,一些闹学潮的学生领袖被学校开除,学潮受到打压。“旅陕甘肃学会”商议,给北京政府发电呼吁,以寻求支持。西安所有的电报局都有军警把守,电报无法发出。保至善和同学们商量后决定去甘肃泾川邮局发报。他们连夜出发,一路上餐风露宿,经彬县,翻过永寿的山梁,从长武县走到了泾川,历时三天,步行四百多公里,才发出了电报。

1925年,在西安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保至善与西北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参与西安各界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驱逐陕西军警督办吴新田的“驱吴运动”以及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群众示威游行等进步活动。

1926年3月,返校不久的保至善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学子的信,信中诉说了崇信教育局局长王安堂贪污腐败、贿赂官员、克扣学生补助费等事宜。保至善看后连夜奋笔疾书《崇信教育局局长竟如斯耶》一文:“崇信在甘肃固属小县,风气闭塞,交通不便。而其教育之腐败与黑暗,及教育局局长王安堂之混沌无耻,犹令人忍痛难已也。兹犹其荦荦大者,略举如此:王安堂前任第一高小校长时,人格卑鄙,又无学识,讲解不清,漠然从事,管理松懈,学生吸烟赌博,竟置之不理,以致青年耗废光阴。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凡有血气、孰不痛恨切齿耶?后被省视学胡师文,以萎靡不振,旷弃职务,报告撤销。后又钻营官厅,运动绅士,取得教育局长。当时教界哗然,群起质问县长张明道。而张明道已受运动,同道作弊,以压制手段,相与狼狈。学界诸人,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甫莅局任,即将前曾主察各初小补助费,勒扣不发,致各校顿呈困顿之象。平凉中本籍学生,既补给每年每人四十千文之学费,忽亦停止,致留平学生大受经济之困。最可恨者,将学款视若己有,贮蓄伊家,作巨本营生,在预算表上,虚添浮报,诸如此类,罄竹难书。即此以观崇信教育之腐败,可以窥一斑矣!而王安堂一人实属罪大恶极,崇信青年,将何以处之?”全文鞭笞丑恶,痛陈时弊,言辞犀利,笔锋辛辣,悉数罗列了崇信教育腐败官员的贪腐罪行,猛烈抨击了教育界腐败之风,深刻揭露了万恶旧社会腐败“吃人”的社会本质。并刊载于3月30日《觉院》月报第二期第三、四版。文章发表后,平凉、崇信等地学子积极响应,纷纷在街道两侧张贴,群情之下,王安堂被撤职查办。

1926年4月,河南军阀刘镇华趁直系军阀吴佩孚向北方国民军发动进攻之机,组织起了一支号称十多万人的“镇嵩军”的旗号,将西安四面包围。保至善和西北大学的进步学生在西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积极支援杨虎城和李虎臣将军的护城斗争。一直到11月27日,刘镇华率军撤退。在这八个月的时间,西安城内粮食极度缺乏,城内有五万多军民死亡。

1926年底,保至善在刘含初的介绍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围城期间,国立西北大学遭受了重大打击,教员和学生大量流失,经费欠缺,维持困难,被迫停办。保至善无法再完成学业,便滞留西安等待组织交给他的新任务。

(连载一)



□ 丁秀山 □ 述/曹建华 整理

1939年,我的父亲丁伟成是国民政府甘肃邮政局的工作人员,由于家境尚可,加之父亲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因此1939年我刚满16岁,在兰州上完了初中,考取了兰州农校。

我入校不久,父亲听说同仁要将自己的子女送去夏河拉卜楞成立“甘肃拉卜楞边区初级职业学校”读书。他了解到这是一所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组织部主办的学校,师资力量很强,教师大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人士。父亲本来就对我上农校不是很满意,认为学农业技术没啥前途,一辈子要和土地打交道。而夏河这所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招收学生50人,分畜牧、卫生两班。食宿,衣物均由学校供给,经费由地方财政支出。不但能够学到更实用的技术技能,还有财政支持。一旦战争结束(抗战),国家建设一定需要有一定技能的人才。就这样我从念了二个月的兰州农校退学,在1939年底随工作调动的父亲去考夏河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夏河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招收的正是16-20岁的初中毕业,所以我很顺利的考入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就读。

当时的国民政府能将职业学校教育开到夏河县这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很不容易。而我,能够在西北偏远地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有一隅安静的地方读书,真是非常幸运。

学校校长是刘廉克,德国留学归来学生,由国民中央政府组织部派遣担任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校长。我通过考试被录取到卫生职业班。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最初将学校设在甘南的藏民小学院内,院子不大,不大的几间教室里的学生们大多来自临夏甘南。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康建兰,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医科专业,给我们主讲外科学。除了专业课,学校还给我们上语文、数学、历史。这些老师们留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是,虽然工作、生活在偏僻的西北,但是他们的着装很讲究,干净整洁,言谈举止优雅大方,具有绅士风度。

我们专业老师们除了授课,课余时间还给当地的老百姓看病,不过来看病的人还是很少,藏族群众们一般不来,他们不信奉西医,主张念经祈祷。

闲暇休息时,我们也去甘南街上玩,冬天周围一片苍凉,但是当春夏之际景色还是很优美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年少的我们也带来一丝欢乐。课余基本没有其他文化娱乐活动,我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度过闲暇时间。

1941年我们快毕业时,学校更名为“国立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并交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理。1942年我与同学们一起回到兰州,在当时的翠英门甘肃省立医院实习,完成了我们学业。1946年3月,更名为“甘肃省立夏河简易师范学校”。1949年10月,学校由九甲搬至河南村(原夏河县国民党党部)。1950年秋学校更名为“甘肃省夏河初级师范学校”。1956年学校由河南村迁至马莲滩。

1959年,因夏河县更名为德吾鲁市,学校因此也更名为“甘肃省德吾鲁市师范学校”。1960年,更名为“甘肃省夏河师范学校”。1966年9月学校搬迁至州府合作,更名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师范学校”。1969年至1972年期间,学校办学规模扩大,改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综合专科学校”。1972年后,又恢复校名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师范学校”至今想起来这都是七十年前的事了。尽管当时办学时间短,但还是给临夏甘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些实用人才。

岷州荔川地名由来

□ 潘硕珍

理川镇在今宕昌县北部,东临木耳乡,西临庞家乡,北接八力镇,南至脚力铺。理川古称荔川,有人认为是源于古羌族复姓“荔非”,简化为荔,荔姓人居住在陕西、甘肃等地。

据《实用汉字字典》解释:“荔”同“荔荔”的“荔”。“荔:植物名,当归。”又据《尔雅·释草》解释:“荔,白蕲。”朱骏声解释:荔、蕲,皆即当归。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古人娶妻为嗣续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荔川,生长荔荔(当归)的川地,也就是说,荔川是岷州当归的原产地。据史载,岷州腊子口(今属迭部县)、花坡(今属宕昌县南河镇)、上沟、中寨沟等地还有野生当归。宕昌县理川镇、八力镇、庞家乡、阿坞乡、木耳乡、哈达铺镇、南河镇等14个乡镇是当归主产区,岷县各乡镇也普遍种植当归。历史上,宕昌县大部分归岷州管辖,因而人们称当归为岷归。

当归的人工种植至迟在三国时期。据史书记载:“初,姜维诣亮(诸葛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远志、当归皆中草药名,双关语。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宕昌羌首领梁霸建立宕昌国,宕昌镇、良恭、阿坞、荔川和岷县间井、申都、寺沟、麻子川等乡镇均在宕昌国版图内。宕昌国力弱小,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当归是宕昌国的特产,是宕昌国给北朝皇帝的贡品:“梁天监四年(505年)正月,宕昌国王梁弥博来献甘草、当归,诏以为使持节,都督河凉两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

晚清岷州壬午(1882年)科举人王继政在《岷州乡土志·物产》中说:“当归:粪种成者入药上品。唐苏恭以宕州(今宕昌县)者为胜。”苏恭,本名苏敬(599—671),唐朝著名医药学家,唐高宗显庆年间,与李勣等20人撰成《新修本草》,其中说:“当归产宕州者最良。”当归被康熙年间岷州抚民同知余说写入《岷州卫志·物产·药类》。岷州当归也被商人打入中原市场:“而马坞镇羌活、当归等物,近发东陕,远且及于各省。”“即此(当归)与党参、芪芪为岷药材大宗。”

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宕昌国归附北魏。北周武帝保定五年(565年),大将田弘(纪干弘,曾任岷州刺史)灭宕昌国,以其地为宕州(今宕昌县)。唐肃宗乾元元年(759年)复设岷州,下辖溢乐(今岷县)、祐川(今宕昌县理川镇)、和政(今岷县梅川、中寨一带)三县。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岷州梅川、荔川、间井寨、通远军、熟羊寨置牧养十监,经营牧业。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政府在岷州设置临江铺、宕昌、荔川、梅川、间井五寨。元明清时期,宕昌县在岷州辖地内。

荔川人尚武,民风剽悍,恃武好斗,蛮横无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岷县县长蒲葆阳改荔川为理川,意在文明开化,以理为先。1961年12月,理川镇划归新独立的宕昌县。

砖影绰绰 文韵悠悠

□ 王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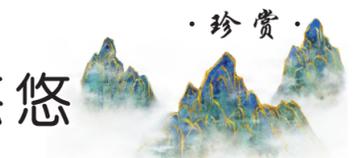
砖雕是古建筑雕刻中很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一般用来装饰宅第、园林、门楼、门罩及官邸或祠庙的八字墙。在江南地区,只要略具规模的住宅,大多沿着纵轴线布置花厅、轿厅及住房,形成一进又一进的庭院,每一院落都设有库门以分内外,而在门框上用水磨青砖砌成线脚向外突出并复以瓦檐,形成单独的门楼,这是宅院建筑不可缺少的构件。为了气派美观,门楼上须配有适宜的横额题字,有些还请名流雅士赐题。两旁还点缀人物故事,以及花鸟鱼虫、吉祥如意图饰花纹,加以精雕细刻,作为装饰。民谣里“花墙头,百子格”指的就是砖雕门楼。

砖雕,始于秦汉时代的画像砖。画像砖采用模印的方法,使砖坯上形成浮雕的图案。后演化为砖雕。从玄妙观三清殿内须弥座上的砖雕可见,早在宋代,江南就已有良好的砖雕工艺。明朝嘉靖年间,江南的砖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当时朝廷指定陆墓御窑烧制的水砖,因它的质地细腻坚实,为砖雕提供了优质的材料,使江南砖雕的表现力更加丰富精美。在题材上,砖雕以龙凤呈祥、和合二仙、刘海戏金蟾、三阳开泰、郭子

仪作寿、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松柏、兰花、竹、山茶、菊花、荷花、鲤鱼等寓意吉祥和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內容为主。上好的陆墓金砖,先经水磨磨光,描上图案纹样后,艺人们运用平雕、半圆雕、浮雕、镂雕、透雕等技艺手法加以雕刻。江南门楼的砖雕,刻画细腻,线条流利,刀法圆润,一般形式犹如两堂神龛,有的甚至如戏台作斗拱挑出,上有檐角飞纵,嫩饊砖高翘。下刻飞鸟形的“排科”,两旁还缀有花篮式的挂络,造型雄伟而古朴,结构严密而灵活,主题扼要简练,层次分明而细腻,极富韵味。江南砖雕那细腻圆润、典雅精美的江南装饰风格,较之北京、安徽、山西、岭南等地以浑厚繁复、恢宏大气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具有艺术清新秀雅的典型特点,获得了“南方之秀”的美誉。



砖雕的艺术风格,明代的砖雕较为古拙朴素,以东山明善堂、瑞霭堂及天官坊梵门桥弄陆宅的门楼照壁为典型代表。清代康、乾以后,风格渐趋于精致华美、艳丽繁复,注重情节内容和构图。艺人可以在方不盈尺的砖版上,用透雕分出近、中、远景几“层”,刻得最深的达十几层。画面的布局,也大都借用立轴和手卷之法表现而更显典雅严谨。当时,



苏州府内的砖雕名家辈出,高手林立,留下的砖雕门楼多达一百数十余座,散布于古城小巷深宅之中。如大石头巷吴宅“四时读书乐门楼”,东花桥巷中和里汪宅、滚绣坊顾宅、卫道观前民生里潘宅、仓桥浜邓宅等都是艺术性较高的砖雕精品。其中最为著名的集大成的砖雕门楼,要数古典园林网师园的“万卷堂”和东山“雕花大楼”的“春在楼”,其精美的砖雕艺术鬼斧神工,享誉中外。据载,清代江南有雕刻名匠许某和冯某,都擅砖雕,《府志》上赞曰:“技艺皆精。”醋库巷柴氏观园和德庆坊赵氏义庄都留下了他们的作品,可惜只知其姓。

在砖块上施行雕刻和木头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善于砖雕的艺人大都会木雕,有些就是娴熟各类雕刻的名家。以“雕花赵”地名的赵子康、赵风云父子,除精于竹、木、牙、石雕外,也是砖雕的一代大师。各类雕艺技法中数砖雕最为不易。因为砖质坚硬易于爆裂,一刀下去,落手无情,所以腕力指功要拿捏得十分准确,否则一件精致的作品完成在即,却由于最后几刀失手而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故艺人于砖雕刀具十分讲究,要求很高,大都采用坚硬锋利的钨钢刀头,由艺人自己亲手磨制而成。所谓“三分本领,七分工具”就是这个道理。为便于更好地雕刻细微部位,也有艺人采用前辈经验,用生石灰加糯米汤浸敷金砖,增加砖版的柔韧性,使之容易雕刻。但一些经验丰富,功夫娴熟的高手,如赵风云因自小随父学艺,浸淫雕艺近六十年,艺高人胆大,就能不经处理直接操刀砖版,以刀代笔,流利圆润,纤毫无差。其技艺令人叹为观止。